

獻
給

獻身於中國現代化的人

——
他們

忠於中國的過去，
更忠於中國的將來。

從傳統 到現代

中國現代化與
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

TRADITION
MODERNITY

金耀基
——
著

中華書局

金耀基（King Yeo-Chi, Ambrose），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家，散文家和書法家。一九三五年生，浙江天台縣人。台灣大學法學學士，台灣政治大學政治學碩士，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社會學系主任，社會學講座教授，大學副校長、校長等職。先後於英國劍橋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訪問研究，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任訪問教授。二〇〇四年自大學退休。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一九九四至今），西泠印社社員。



目錄

導言 | 8

上卷 | 從傳統到現代（一） 中國的現代化

上卷自序（二〇二三） 22

簡體字版自序（一九九九） 24

自序（一九六六） 29

第一篇 中國的傳統社會 36

第二篇 巨變中的中國 82

第三篇 現代與現代化 104

第四篇 中國的現代化 127

上卷附錄 再論《從傳統到現代》 166

中國現代化的動向 —— 一些觀察與反省 182

中國現代化與價值之定位 210

下卷 | 從傳統到現代（二） 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

下卷自序（二〇二三） 222

中國「現代轉向」的漫長革命 224

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
—— 論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 251

中國之「現代型國家」的發展困境 267

國家儒學體制及其轉化
—— 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重構 292

東亞經濟發展的文化詮釋
—— 論香港的理性傳統主義 317

東亞另類現代性的興起 337

儒學、現代性與亞洲的民主 354

文化自覺、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性之構建 378

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探索
—— 從民本到民主的歷史之路 393

大學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 407

大學教育的人文價值 421

現代化與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 431

下卷附錄 創造現代文明新秩序 450

《二十一世紀》、楊振寧、二十一世紀 454

譯名索引 464

參考文獻 468

導言

一

本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從傳統到現代（一）中國的現代化》為一九六六年首次在台灣出版的《從傳統到現代》，該書此後在台灣與大陸有多個版本，這次與下卷《從傳統到現代（二）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合為一書，第一次在香港中華書局同時出版。二者之所以上下合卷出版，蓋因「中國的現代化」與「中國的現代文明的建構」講的都是「從傳統到現代」的中國百七十年大的歷史故事。

二

一九六六年《從傳統到現代》出版之時，台灣的知識界、文化界還沒有完全走出年前發生的「中西文化論戰」的濃煙密霧，而中國大陸則正爆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像所有現代的中國知識人一樣，我對中國的未來是充滿焦慮的，但多年的研究與苦思，使我有了一個強烈的信念，那就是中國未來的前途在，並且只在中國的現代化；實則，此書之所以作，實為闡明中國現代化是中國歷史的必由之路，在該書自序上我指出：

中國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條，即就是中國的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不僅是中國歷史文化在「勢」上，而且亦在「理」上必有與當有之發展。

中國現代化運動是莊嚴神聖的運動，它不只忠於中國的過去，更忠於中國的將來。

《從傳統到現代》出版後，令我倍感欣幸的，不盡是因此書帶給我的虛譽，真正是因當年國民黨在台灣所開啟的現代化（特別是工業化），使台灣到七十年代後期，已榮登「亞洲四小龍」（中國台灣和香港，韓國、新加坡）之一，成為在世界範圍內最成功的「新興工業國家與地區」；更令我欣然不已的是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後在「文化大革命」的荒蕪廢墟上，鄧小平揭櫫改革開放之大旗，揚棄階級鬥爭，改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推動「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自此中國展開了一個歷史的新運會。拙著《從傳統到現代》也因此得以進入中國大陸，並獲得頗大的迴響。此後近四十年，海峽兩岸的中國大陸與台灣都在現代化的快速道上奔馳。台灣於八十年代在成功地實現經濟現代化之後，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於社會籲求民主之聲勢日高之情形下，深感時代已變，潮流已變，並相信立憲民主的目標的時機已經成熟，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他終於決定廢除「戒嚴」，解開報禁、黨禁，蔣經國扭轉乾坤之一舉開啟了台灣政治現代化之路，使台灣在中國現代政治文明踏上一個初級台階（見金耀基〈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探索〉，收入本書下卷）。而中國大陸，在經濟現代化的頭十年摸石頭過河，備極艱辛，先後發生了八六學潮和八九社會運動，蘇聯共產國際體系更於一九九一年轟然崩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第二次南巡，重振改革開放的強音，自此中國持續地在「四個現代化」的快車道上飛奔。九十年代後期，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二〇〇一年進入 WTO，中國更成為「世界市場」，二十一世紀後，中國的 GDP 逐次超過了英、法、德，到了二〇一〇年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二〇一一年，西

方著名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 Apps》（*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中說：

中國的工業革命是最大最快速的工業革命。

世界重心從西方轉移到東方。

我們很可能親眼目睹西方過去五百年的優勢遭到逆轉，一個文明逐

漸衰弱，而另一個文明崛起強盛。⁰¹

誠然，中國現代化到了二十一世紀初葉，已經取得了傲世的成就，並且已經被視為一個新的工業文明的身份在亞洲升起。

三

回顧中國一百七十年現代化歷史，清中葉的鴉片戰爭是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對中華帝國的侵霸，而在另一個意義上，也是西方工業文明對中國農業文明的衝撞。清朝一敗再敗於西方工業化的帝國集團，中國卒淪為「次殖民地」，中國傳統的古典文明，從軍事、經濟、政治，到文化思想、價值觀念，一一受到挑戰、衝擊，甚至面臨解組、崩潰的險境。中國一百七十年現代化歷史中，每個時代志士仁人心中鼓動着的無不是強烈的「救亡圖強」的意念。鴉片戰爭後，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自強運動、清末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孫中山的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國民黨的抗日救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後中國共產黨推動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無一不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救亡

圖強」。無疑的，「救亡圖強」是一百七十年中國現代化（自覺或不自覺）的一個目標。

今日，客觀地說，中國現代化的「救亡圖強」的目標已經達成了。在這裏，我必須指出，「救亡圖強」之外，中國現代化還有一個更積極性的目標，那就是「建構一個中國的現代文明」。這也是本書下卷《從傳統到現代（二）》的論述主題。

四

中國的現代化是清中葉展開的，必須知道，當時之清朝是秦漢之後一直維繫不變的帝國君主體制，同時，也是延續秦漢以來以儒學為本的一個雄峙東亞的「文明體」（civilization entity）。鴉片戰爭（一八四二）中，天朝上國敗給蕞爾三島的英倫，遂有李鴻章「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驚歎；但當時朝野的精英皆以文明上國的眼光，視英國為藩邦蠻夷，有曰「英夷乃一渺小可憎之族，惟持其船堅炮利耳」⁰²。曾、李之洋務自強運動，以「開鐵礦、製船砲」為第一要務，實出於「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魏默深語）之工具心態，初無效法西方文明之真意，但甲午一戰（一八九五）年，大敗於東鄰日本，痛定思痛，國人認識到日本之勝中國者乃在其成功的「西化」，康、梁之維新遂有「君主立憲」之論，其後孫中山之「共和革命」皆有取法西方，建造中國現代政治文明之想像，「晚清新政」之重臣張之洞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奏罷歷 1400 年之久的「科舉」，主張設學校，引進西學、西藝，以為國家備儲現代人才，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舉「科學」「民主」，則更掀起了一

01 弗格森著，黃煜文譯：《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 Apps》，台北：聯經出版書業公司，2012，頁 383，389，399。

02 參見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頁 42。

場思想文化上的「啟蒙運動」，把中國決定性地推向「西化」與「現代化」的道路。在此必須指出，「現代化」不等於「西化」，但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現代化與西化二詞的意義有一定程度的重疊性。簡單地說，西方（指西歐與美國）是世界範圍中最早現代化並最早完成的「現代性」（現代性即是現代文明之特性），故中國現代化要建構的中國的現代性（現代文明）必不可能不與西方的現代性有「共相」者，此我在本書中屢有論述。

無疑的，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的誕生，是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一個里程碑，但我們知道，滿清帝制雖被推翻，共和民主之路卻坎坷顛簸，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內有軍閥割據，外有列強覬覦，中國現代化一波三折，步履艱難，但國民黨北伐統一，定都南京後，則為中國現代化發展十年黃金時期，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八年抗戰，造成中國軍民犧牲之慘重罄竹難書，而中國現代化之大業更因此斷層。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國慘勝，而未幾全國又陷於國共內戰，最後中國國民黨敗退台灣，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此之後，國共二黨，隔著大海，各自走上發展之路。

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第一個五年計劃走的是毛澤東主張的「一邊倒」政策，全面推行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工業化（重工業）上取得一定的成績，但一九五七年（斯大林已逝世），毛澤東繼「反右」運動後，又以一種驚人的奮亢浪漫激情，發起「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〇）。通過群眾大動員，搞大煉鋼、搞修大壩、更大搞人民公社，以跳躍的方式，跳過「社會主義階段」，直接向「共產主義」進軍，其結果是造成了

中國經濟的全面混亂，無疑是一次與現代化反其道而行的運動。一九六六不意又爆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這就是令中國陷於「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個既反中國傳統文化，又反西方文明的「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不僅使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更使中國現代化進程遭到扭曲、阻滯與破壞，中國現代化歷史之路充滿折騰、顛簸，真是人間正道是滄桑。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中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進程，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以鄧小平為領導的實踐派共產黨人一次決定性勝利，這是中共建國以來一次重大的歷史轉向。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這是中共第一次把「現代化」提到全黨工作重心的高度。

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在本質上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政策宣示，但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必須走自己的道路，他主張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即中國之富強已是現代化的首要目標，因此所推動的也不再是「蘇式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顯然的，中國已脫離正統社會主義規制，它在國家所有制外允許市場經濟、允許私有財產；它在政治專政下，容忍一定程度的經濟與文化的自由，簡單地說，中國的改革是力圖結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些元素來推動國家最大化的現代化。一九八五年美國的《時代》雜誌選鄧小平為是年的「風雲人物」，並指出：「這個改革是一場賭博，它們面對國內相當多的反對，但是如果這個改革成功，則世界不復舊觀。」誠然，鄧小平的改革雖不宜以「一場賭博」來形容，但確實需要極大的膽識與「理論勇氣」，而此後三十年，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下，中國固然出現了「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形貌，世界的格局也真是不復舊觀了。

我們知道，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及推動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並非一帆風順，無風無浪的。根本上說，鄧小平一面倡導「四個現代化」，一面高舉「四個堅持」，這裏面始終存在政治上向左，經濟上向右的矛盾。並不完全出乎意料的，一九八六年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學潮，一九八九年再出現震動中外的社會運動，其所表達的最大訴求是自由與民主。深層地說，二者的原初動機都是站在「改革」的立場，他們與黨政當局的衝突也非絕無妥協與和解的可能，但事實是，最後以悲劇告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又遭遇到一次重大挫折。

歷史的發展常難預料，一九九一年看似穩如磐石的蘇聯共產國際體系，轟然崩塌，美蘇兩極對峙之局轉為美國獨霸的單極世界，深一層說，美蘇冷戰競爭結果顯示的是：「蘇式現代性」決定性地敗給了「西方現代性」；中國因有一九七八年開展的改革開放，才避過了與蘇聯陪葬的命運。

一九九二年一月，八十七歲的老人鄧小平自北京南下深圳和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展開了為期五星期的著名的「南巡」。「六四」沒有動搖他改革開放的初心，對於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文獻，他表示「一字不需改」，並發出黨中央領導層如不堅持改革開放，就應下台的警語。很明顯的，鄧小平堅信「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不可不走的歷史之路。鄧小平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的信徒，但這沒有妨礙他更是一個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他曾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發生了立竿見影的影響力，它鞏固、深化了一九七八年倡導的改革開放；並拓開了此後三十年的中國現代化大路，使中國百年的現代化雄健地攀登歷史的新高地。

從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之年），在江澤民、朱鎔基擔任總書記與總理任內，中國國民經濟總值（GDP）平均增長率為 11%，這是令世界驚歎的高速，中國已被賦予「世界工廠」的稱號；「中國崛起論」「中國威脅論」開始成為世界媒體的熱門話語。二〇〇〇年中國進入 WTO，自此，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全面接軌，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二〇〇三—二〇一三），在胡錦濤、溫家寶為總書記與總理任內，中國經濟持續以 9% 的高速成長；中國現代化工程由點而線而面，在一個蓬勃生猛的「生產革命」之後，接着是一個百花綻放的「消費革命」，二〇一〇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不但是世界最大生產地，也是世界最大市場。大面積的城市化（成百上千的大小城市）的開展，龐大資訊交通網（特別是公路、鐵路與航空、船輪）的構建，同時，國防、金融、財政、教育、科技、學術、文化、體育、媒體等各個領域的巨大發展，中國社會的面貌與體質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由「前現代型」文明快步向「現代型」文明轉變，從人口結構與農工業生產率的比重來看，中國已成為一個現代的新工業文明體系了。毫無疑問，中國已實現了百年追求的富強之夢，中國亦由鴉片戰爭後淪為「邊陲」地位重新進入到世界秩序的多元的「中心」地帶。中國至此真稱得上是一個現代化大國了。二〇一三年之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稱中國要從現代化「大國」向現代化「強國」推進，他更再次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把中華文化復興與現代化聯結起來。誠然，四十年來，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工程，一直在建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二〇〇九年，英國的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了《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⁰³。他認為古老的中國已創立了一個特具中國性格的「現代性」，也即是一個「中國現代文明」的新模式，並說在當今「現代性競爭」的時代中，中國的現代性模式更具優勢。

六

我對中國「現代化」的研究始於一九六六年出版的《從傳統到現代》（即本書的上卷），而我對中國「現代性」的探索，第一次正式論述是一九九四年我在北京大學「潘光旦先生講座」中發表的〈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論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收入本書下卷）。在那篇論文中，我提出中國現代化之目標應在建構一個中國的「現代性」，也即一個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我寫這篇論文時，距我出版《從傳統到現代》已經二十八年。當年我談論最多的是現代化，但較少談「現代性」，這次我則把重點放在「現代性」的問題上，並且提出「中國現代性」的概念。在這裏，我特別要指出，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反現代化」「去現代化」的運動。從根源上說，這是對「現代性」（指西方的現代性）的不滿，故「去現代化」是一種「去現代性」的衝動（*de-modernize impulse*），而此一衝動特別強烈地表現在環保運動、神秘性宗教運動等。同時，美國的「現代化理論」（指西歐以及特別是美國完成的「現代性」，不止是「現代性」的第一個案，而且也是「現代性」的普世化的典範）到七十年代已受到普

03 中譯本參見雅克著，張莉、劉曲譯：《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遍的質疑與挑戰。八十年代西歐思想界在「後現代主義」思潮衝擊下，學術界更發生了一場「現代性論辯」，對「現代性」（指西方的現代性）的制度面、文化面的根本性的病態、缺失作出深刻的反思。⁰⁴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西方現代性」之問題，正可以為現代化之後來者作為鑑鏡。事實上，東亞（日本等四小龍）的現代化經驗有力地顯示東亞社會建構或建構中的「現代性」與「西方現代性」有「共相」，但沒有「同一性」，這說明現代性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民族文化傳統在現代性建構中必會產生作用與影響。所以，我在一九九四年論文中指出，「西方現代性」外可以有「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並強調中國現代化最終要完成的「中國現代性」不能也不應是「西方現代性」的翻版，而建構的中國現代文明則是「現代的」，也是「中國的」。⁰⁵

七

中國現代化，時序上說，自十九世紀歷經二十世紀到今天的二十一世紀，是跨越三個世紀的歷史進程，在這一百年中，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它是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思想文化等各個層面的社會大轉化

04 參見金耀基：〈現代性論辯與中國社會之定位〉，《社會學與中國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此文原是作者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系列講座中發表的。

05 2001年在德國柏林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中，我發表的 *The Emergency and Alternative Modern* 的演講，進一步闡析了我1994年論文中指出的「另類現代性」的概念與史實。中譯版參見〈東亞另類現代性的興起〉，收入本書下卷。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實際上，這也正是一次文明的轉型(civilizational change)，即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在這個文明轉型的過程中，人的生、老、病、死，日常的衣、食、住、行都有了變化。今天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生存形態與百年前的中國人已有根本的轉變。誠然，生於工業文明的人，對時間、空間都有了新的感受，甚至在人生觀、生死觀、宇宙觀都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我在本書上卷中指出中國現代化促成了中國文明轉型，這個轉型涉及到三個層次，即：

器物技能層次(technical level)的現代化

制度層次(institutional level)的現代化

思想行為層次(behavioral level)的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是一個有方向性的歷史發展，十多年前，我再提出中國現代化的三個主旋律(主旋律外當然有次旋律)，這是我從逾百年現代化的歷史經驗中抽繹出來的理論性表述，中國現代化的三個主旋律是：

從農業社會經濟到工業社會經濟

從帝制君主到共和民主

從經學到科學的範式之變

這裏我要說明，我說的中國現代化是指海峽兩岸的中國的大陸與台灣。二〇一三年，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名為《中國現代化的終極願景》的自選集，我以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秩序」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最終願想。二〇一四年我應邀在台灣高雄中山大學的「余光中人文講座」中發表了〈中國現代化與文明轉型〉的演講(收入本書下卷)，進一步闡明了「中國現代文明秩序」包括的三方面的內涵，即：

一個有社會公義性的可持續發展的工業文明秩序

一個彰顯共和民主的政治秩序

一個具理性精神、兼有真善美三範疇的學術文化秩序

我意識到，「中國現代文明秩序」還遠未建構完成，在建構的過程中，還不免會遭遇到困難與挫折，但它是無數代中國志士仁人的歷史共業，已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思想力量，我希望甚至相信在二十一世紀內，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明將會修成正果。書寫至此，我不由想起明末大儒顧亭林的詩句：「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

八

年前，香港中華書局趙東曉博士、侯明女士建議，在香港首次以繁體字重版一九六六年的《從傳統到現代》。同時，擴大出版《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的論文集，亦即在「從傳統到現代」的同名下二書合卷出版。我欣然接受趙、侯二位深獲我心的建議，因為《從傳統到現代》二書都是講述百年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大歷史故事，當全書即將出版之際，驚覺我已是八十八之年的老人，而一九六六年《從傳統到現代》第一書出版時，我正是「三十而立」的青年，歲月飛馳，真不無今昔之慨。東曉、侯明為此書催生，所付出的心力，是我深為感念的。楊安琪小姐在編輯和索引上所作的精細繁重的工作，令人感動，我在此鄭重向安琪表示謝意。

金耀基

二〇二三年三月一日

香港結束口罩令之日